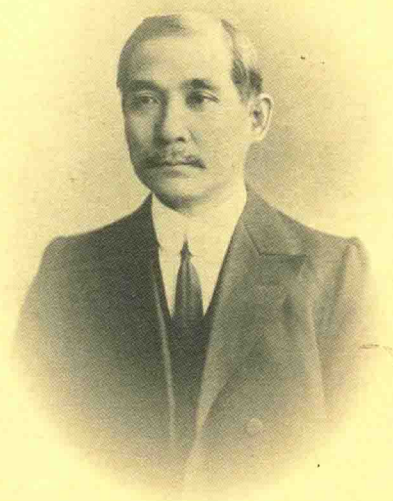


中华学人丛书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 桑 兵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学人丛书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 桑兵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 桑兵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2

(中华学人丛书)

ISBN 978-7-303-10184-9

I. ①孙… II. ①桑… III. ①孙中山(1866~1925) —思想评论 IV. ①D69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8710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60 mm × 230 mm

印张: 22.5

字数: 330千字

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8.00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谭徐锋 周劲含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自叙

吾友移席某市，相见称，彼处凡学历史者皆不治史，凡治史者皆非学史出身。闻言感慨万端，此实将近来学界的种种弊端一语道破。时下一些学人对本行现状多有不满，或归咎于故人，或借鉴于别科，于是赶超前贤，跨越学科之说甚嚣尘上。至于如何超与跨，无非以立异为创新，在本学科以不知为无有，在他学科以不懂为新奇。所欲超越者，多半为必不可少而尚未掌握的行规，则标新立异不过是越矩违规。此类言行，看似好标高的，胆大妄为，实则内里空虚，对已知不自信，对未知则盲从，究其实，还是学问未上轨道。

治学须在技术层面以上才能发挥个性，若以规矩为束缚，则门径已成局限。近年来不少学科的学人不安于位，愚意原因还在对本学科的基本规矩知之不深，所以易于动摇。以史而论，不知如何弄清史实，便欲纵论史识史鉴，如此不温故而欲创新，难免半桶水之妄。而无知者无畏，读书越少越放言无忌，与前贤读书越多越不敢说话适成反证。世风亦推波助澜，或自命权威，或诩为典范，以为站在侏儒身上便成了大师。又惟恐别人不认，复设立奖项称号，诏告天下，功成名就，以期不朽。为学者因而不在学术建树方面争久远，惟争一时名利之得失，关起门来水准越评越高，放之四海则难免每况愈下，自欺欺人之举在学术界或有泛滥成灾之虞。据说某市曾有“到本世纪末”引进和培养大师各10人的宏伟计划，如今新千年早已来临，大师却踪影杳然。

上述现象，晚清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中学在与西学的冲突中日益失势至关重要。中学无本，则学术多由外来，本既在外，不易知其详，人类天性又趋易避难，学人复好新奇而畏艰深，加之传媒哄抬，学子风从，游谈无根之说自然大行其道。本来学问之事

讲究天赋和训练，最不适于多数取决，必以此定学问之优劣得失，绝无政治民主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纠错效果，只能在人多势众的喧闹中使民族的智慧流于平庸。

历史研究，政治史本为传统正史的主体，在欧洲近代学术变迁中，则是变革的主要对象之一。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兴，正史自然受到冲击。到1924年，章太炎已经批评时人治史受日本东洋史学的影响，“重文学而轻政事”^①，“详于文化而略于政治”。^②随着历次革命的凯歌式进行，政治史再度成为学人关注的重心，只是偏于事件。革命结束后，以革命史为中心和归宿的政治史又逐渐冷却。20世纪中国诸如此类的循环不仅随处可见，而且多次重复。至今恐怕很少有人回味渐入颓唐的章太炎的言论。由有学问的革命家退居宁静的学者，政治上逐渐淡出前台，思想上也趋于保守，学术的思考反而因此能够避免过度的情绪化，在西学大潮排山倒海般涌来之际，强调民族固有的特性，是非正误姑且不论，整体上可与新文化互补，当是不争的事实。研治中国史事，不能不受历史进程和资料遗存样态的制约，重政事适为表现之一。中国历史文化一以贯之，制度史自然受到格外重视。而在常态的社会史研究之外，重大事件和人物研究肯定会魅力永存。时下外行介入，主要即在这类领域。

治史学如弄文学，做什么固费斟酌，怎样做尤其重要。时人好从选题区分宏观与微观，其实做什么虽然具体，怎样做却能举一反三。治史目的首在求真，但在重建史实的过程中，所揭示的绝不仅仅限于史实的真伪。“讲宋学，做汉学”一途，最要在所做工夫均能体现微言大义，而又处处皆得征实。离开史学专谈史法，难免两面脱节，流于空泛。即使有必要建立新的解释框架，也应通过一定的具体研究表现出来。所以，同一题目出自不同人之手，格调品味，高下有别。以成果分，品类有四，曰不看也知，一看便知，看到即知，看也不知。

所谓不看也知，其选题便不能成立，堕入学术陷阱，即使自圆其

① 章炳麟：《救学弊论》，《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15日。

② 章炳麟：《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新闻报》，1924年7月20日，引自《北京大学日刊》第1526号，1924年9月24日。

说，也离事实真相愈远。一看便知者，能将所见材料排列，或叙述人事之大体，或分析问题各方面，虽无新意，尚不越矩。此类切忌以前人尚无系统专门研究等语自我标榜，因所说已为前贤分别道出，或在意料之中，虽无专篇，或系唾余。看到即知，指其专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又有上下之别，上焉者以新材料贯通旧材料，识一字成活一片，开创新解，纠正陈说。下焉者乘空蹈隙，求新奇而偏一隅，以琐碎为发现。看也不知者，所用虽常见材料，其大能够融会贯穿，通方知类，其小可以读书得间，力透纸背，均能发人未发之覆。极高明者，甚至将所用材料一一列出，亦看不出所以然，必经其人讲解论述，指点迷津，方能豁然开朗。除第一类外，其余均在水准之上，但最后一类若不写出或讲出，则重复发明可遇而不可求。或以为学人著述不在乎多一本少一本，一般而言固然，至于做到极高明者，才识机缘，均赖天成，如不在为己之后为人，则不知何时能有继起者悟出，实为学界难以弥补的损失。学术之事，能增加量的扩张已十分困难，要在质的提升方面有所建树，谈何容易？

入门以来，便与孙中山研究剪不断，理还乱。近25年来，适逢孙中山研究经历由“险学”而“显学”的转变，进展显而易见，成果的量极多，面极宽，要找一规模合适又有深度的方向已成棘手难题。但所谓盛极而衰，祸福相倚，中兴里潜伏着危机。其一，从冷变热，吸引了不少学人的关注，也不免成为争食的饭碗，而在量的扩张的同时，质便做了牺牲，低水平的重复不在少数。其二，碗小而僧多，要不断扩大容量，容易流于偏斜，如红学之末流。其三，凡附加许多社会责任之学，往往有些不堪重负，学人反而视为畏途，不愿虚耗精力。如此一来，流品混杂，学术难免等而下之。

平心而论，尽管孙中山研究硕果累累，整体上仍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倒不是用国际拿破仑研究已有传记千余种作为参照，这样的杰出人物无疑会不断成为史家乃至社会重新认识的对象，就学术言，至少有几点可以讨论：一、迄今为止，无论国内抑或海外，已出的孙中山全传中尚无一种得到学界的公认。撇开观念的差异，仅以深入程度论，后续各书恐怕还不及史扶邻1968年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

源》。二、既有成果中误读错解孙中山思想言行者即使不能说比比皆是，也为数不少，还有相当多的部分虽有论点，论据却未经过严格检验，或者只是按照后来的外在观念，为孙中山重塑金身。三、已有的资料很多地方读不懂，当然不是指字面的意思，而是相关的人事及所指，强作解人不过是望文生义。随着新史料的问世，识一字成活一片的情形随时可见。凡此种种，均说明相关研究尚属幼稚。

棘手与幼稚，看似相悖，实则相通，这也正是人物研究的特性。据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中国学界中，凡找不到适当题目又想有把握获得博士学位者，就会以人物研究为捷径。其实，人物研究上手较易，做好却极难。因为不能仅仅描述外形，还要对其言行具了解之同情。这种所谓了解同情，绝非时下等而下之的心理分析之类，用后来的外在观念妄度前人，而要以实证虚，通过了解前后左右的人事及其内在联系，具体掌握其每一言行的殊境、思维、潜意识甚至无意识，不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免诛心臆测。更有甚者，或认为要了解历史人物，须在相关的知识和智慧方面超越对象，否则难以返其本心。孙中山这类人物，时间跨度大，经历事件多，交往联系广，又兼具政治家、思想家等多种品格，经验与智慧均为常人所不及，为人行事往往逸出常轨，要具了解之同情，是对学人见识与功力的极大考验。非有极高天赋，良好机缘，优越条件，并对此情有独钟者立志潜心，十年磨剑，难以奏功。可惜主观条件适合者别有天地，又不愿趋时逐流，偶以余力，只得片断。

治史初窥门径以来，就在以孙中山研究为主业的机构，所谓在商言商，陆续也做了一些功夫。尤以在陈锡祺先生主持下编辑《孙中山年谱长编》，受到的训练最大，而且得益不限于孙中山研究。凡治一人一事，如有长编、纪事本末和考异为基础，必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要做足这些功夫，一人一事亦戛戛乎其难。今人有一绝大误会，以为近代史料易读，治学难度较古代史为低，其实大谬不然。以史料言，陈垣力求竭泽而渔，而近代史料浩繁，无法穷尽。以史学言，陈寅恪治中古史重在制度文化，治晚近史则深入心境，要以实证虚，艰辛也在信而有征之上。所以，编过《长编》之后，愈知不可轻易出手。其时有一撰写孙中山传的计划，得几位师友相邀，分工合作，即主张规

模宜稍大，详尽之后，继以简约，则判断才不至于偏误。所承担 1895 年至 1911 年一段，写到庚子，已逾十万言。后来这一计划因故搁置，心得分别写成单篇论文，或融入其他著述。十年来治庚子勤王史事，实由此发端。本书的几章，亦为副产品。同样受编辑《长编》的影响，关于孙中山与同盟会成立的过程，也是关注的重心之一。

治史切忌为成见所囿，先入为主。从定义出发，或以某人立场为据，均违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正道。而人物研究中，上述正是较为常见的偏弊。有时论战双方看似针锋相对，或维护，或翻案，其实背后的思维认识方式基本一致。有关《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和《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的讨论，很想由前后左右的关系入手，把握当事人的言行，避免以主观设定的标准衡量评价。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中看出所谓规律，远比牺牲史实得出概念化的论断来得重要。

本书收录的各文，或已经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或成稿有年，未曾面世，或为近期写作。已刊者当时或有手眼不到，因而致误之处，此后材料多见新出，随时有所签注，认识也有局部调整，汇集时均做程度不同的增改订正，有的增加篇幅较原来多出数倍，几近重写。这倒不是悔其少作，故意毁尸灭迹，而是想反映自己认识的进展。其中《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成立》和《信仰的理想主义和策略的实用主义——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两文，颇为犹疑。前者为与人商榷之作，章开沅师后来曾教以治学宜正面立论，不宜对面争论，虽然不一定针对此文，却无异于当头棒喝。凡对面争论者，其始既为对方制约局限，其终往意气用事，走向偏激。双方论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而观念和认知方式如出一辙。后者则因为稍前史扶邻教授在台湾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过论点相同、论证较略的论文，限于条件，当时未曾寓目，加以论证方式与目前信守的办法略有出入。另外，《孙中山与新加坡华侨》本来是为一本孙中山与华侨的专书所拟的一章，其体例要求不用注释，后来因故搁置。现尽量补回注释，疏漏在所难免。

本书各文在搜集资料、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中村义、狭间直树、久保田文次、吕芳上、王学庄、容应萸、朱英、胡波以及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各位师友多方面的帮助，谨此致谢。

目 录

上 编

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	3
一、兴汉会与自立军	4
二、兴中会与保皇会	10
三、革命与革政	34
四、余论	44
庚子孙中山上书港督卜力述论	47
一、问题的提出	47
二、两广独立	50
三、拟定与递交	55
四、宗旨与策略	61
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1895—1905）	66
一、澄清史实	68
二、补正细节	80
三、资料与问题	87
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成立	95
一、舍弃兴中会？	95
二、全国领袖	101
三、旧说新解	106

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的政治形象	112
一、文化英雄	112
二、统一与反满	115
三、天下为公	119
孙中山与新加坡华侨	125
一、早期联系	125
二、《图南日报》	129
三、建立同盟分会	132
四、革命大本营	134
五、拥护共和	140
胡适与孙中山	144
一、新文化的同路人	144
二、善后会议	151
三、国民革命	161
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	169
一、接近孙“系”	169
二、统一与分治	174
三、苏俄与中共	180
四、依然同道	192

下 编

孙中山革命程序论的演变	199
一、绾以约法	199
二、共和与专制	205
三、革命方略	211
四、约法与《临时约法》	215
五、由约法而训政	217
六、始终不渝	221
孙中山与传统文化	227
一、语言工具	227

二、偏好史地	233
三、信而不泥	239
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	247
一、政治性格的两重性	248
二、两重性的适度	258
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亚洲观	267
一、强国取向	267
二、本位中心	274
三、济弱扶倾	282
辛亥前后戴季陶的日本观	287
一、了解与警惕	288
二、头号大敌	293
三、扭转潜因	298
《戴季陶文集》与戴季陶研究	306
一、戴季陶其人	306
二、文集的编辑	312
三、日本观	321
人名索引	327
征引书目	336
一、著述文献	336
二、报刊	347
三、档案	347
再版后记	348

上 编

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

1900年是清末政局变动至关重要的一年，前人早已注意及此，从各个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关于自立军起义，用力亦不少，近年来更有新的进展。^①然而，仔细阅读海内外相继问世的各种新史料，感到问题不仅仅是修补完善原有的认识，新材料的出现使得原来旧材料读不通而不得不阙疑处能够成活一片，有关史实的认定及问题的分析完全改观，而学人发掘其潜力则远远不足。新近脱稿的《晚清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用较多的篇幅探讨庚子勤王运动。此外，还撰写了《孙中山致港督卜力书》的论文，并对中国国会领导成员的身世交游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认真梳理。从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这一角度，亦可见一斑。

简言之，勤王运动并非汉口自立军一枝独秀，而由保皇会的两广战略、江浙士绅的江淮密谋以及汉口自立军三股势力结合而成。三者从宗旨政略到组织系统均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交错，为了改变戊戌政变以来中国上下萎靡不振的局面，造成全国大举的形势，进行联合角逐，关系十分复杂。合组兴汉会的湖南哥老会首领不仅始终在自立军中扮演重要作用，而且是革命派的依靠力量。孙中山与兴中会为了乘乱争胜，接受梁启超的意见，同意用借勤王以兴民政作为联合战线的旗号。他们不仅与自立军的行动保持一致，相互呼应，还努力争取保皇会澳门总局的协助，并与汪康年等江浙士绅协议合作。包括保皇会

^① 参见〔日〕深泽秀男：《自立军起义について》，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汲古书院，1992；汤志钧：《孙中山与自立军》，《历史研究》，1991（1）；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2）。

在内的各派均参与发起以反对当朝执政、革新变政为宗旨的行动。只是在实行以武力扫清变政障碍的过程中，一些派系感到实力不足，不能适应，遂放弃使用暴力的企图，并极力将有关史实隐讳掩饰。

一、兴汉会与自立军

讲到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首先应注意兴汉会在自立军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认为，到1900年春，兴汉会事实上就消亡了。^①而在此之前，两湖哥老会已经倒向保皇会。因此，自立军起义时，兴汉会不再发生作用。兴汉会由孙中山、毕永年等人发起，是兴中会与两湖联系的重要组织形式。它的消亡，当然表明兴中会在这一方面的影响无形中止或大大削弱。只是这种看法与史实明显不符。

追根溯源，自立军是孙中山与湖南维新派合作以谋大举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10月，唐才常、毕永年东渡日本，向流亡于此的康有为、梁启超进言勤王举义，争取日本的援助。^②经毕永年介绍，唐才常又与孙中山会晤，“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之起兵策划，有所商榷”。^③11月24日，杨衢云函告谢纘泰：“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但由于自私妒忌的缘故，两党联合可能有困难。”^④前者指唐才常、毕永年等人，后者则指康、梁一派。毕永年本来主张激进，提倡种族思想，戊戌政变发生，自断发辫，火其贡照，“示不复再隶于满清之治下”。^⑤到日本后，毕永年的反满

① [日]手代木公助：《戊戌より庚子に至る革命派と変法派の交渉——当時の日清関係の一断面》，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近代中国研究》第7辑，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

②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381～382页，东京原书房，1968；明治三十一年10月24日东京警视总监西山志澄致外相大隈重信甲秘第155号。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④ 谢纘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2～30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⑤ 民表：《毕永年传》，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22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情绪激化，与康有为已生隔阂，而与孙中山结识，却受到重视。11月中旬，他接到湖南急电，会党起事在即^①，欲归国行动。平山周获悉，以为湖南一隅发动不易成功，与同志商议，希望暂缓其事。孙中山即请毕永年和平山周二入赴湖南视察会党情形。^②

毕永年、平山周视察的结果，认为维新势力已经寂寞无足观，而哥老会“必可为他日革命军之一势也”。^③ 1899年2月，毕永年因事与康有为决裂^④，回到日本向孙中山复命。孙中山得知湖南会党的详情，力主湘、鄂、粤同时大举。是时唐才常再次东渡，与康、梁筹划起兵勤王事宜，与孙中山筹商长江各省与闽粤合作之事。由于保皇会在海外声势浩大，唐才常不便与兴中会合作，态度较前消极，经毕永年、平山周等多方斡旋，始订殊途同归之约。^⑤ 为此，孙中山派毕永年返回国内，联络湖南会党头目。经过努力，毕永年于1899年9月率湖南会党头目赴香港，与陈少白等人商议合作办法。在陈少白、宫崎寅藏等人的帮助下，10月上旬成立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11月9日，宫崎寅藏和陈少白由香港抵达横滨，向孙中山报告组成兴汉会的情况，呈交会长印信。^⑥

1899年11月中旬，林圭等人应唐才常之邀，准备返湘联络会党。孙中山和陈少白、平山周、宫崎寅藏等出席了梁启超、沈翔云等人在红叶馆举行的送别会，席上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林圭临行前向孙中山请益，孙中山为其介绍在汉口俄国顺丰茶行当买办的兴中会会员容星桥。此举应是兴中会与湖南维新派合作的具体体现，双方

① 《毕永年与犬养毅笔谈》，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40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② 据明治三十一年11月28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青木外相乙秘第655号，平山周等人于11月15日由横滨出发。

③ 《湖南现状》，《知新报》第85册，1899年4月30日。

④ 参见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3）。

⑤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66页，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

⑥ 明治三十二年11月21日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致青木外相；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68~174页，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

的确是在通力合作。这时孙中山刚刚成为兴汉会总会长，等于将兴中会在两湖人马的班底作为与唐才常等人合作的基础。林圭返湘不成，临时改到汉口，与容星桥等人一起创办义群公司，骨干即为兴汉会成员。容星桥还帮助林圭在租界寻找开设公所以为联络机关的住房。所以林圭说：

满事未变以前，中峰主于外，既变而后，安兄鼓于内。考其鼓内之始，安兄会中峰于东而定议，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返汉。其中入湘三度，乃得与群兄定约。既约之后，赴港成一大团聚，于是本公司之名大噪，而中峰之大英豪，人人始得而知仰企矣。^①

兴汉会是兴中会与湖南、广东会党的旧式结盟，而非新型社团或党会组织，与盟兴汉会的会党首领多为挑选出来的代表，他们在自立军系统中的地位一直未被动摇。同时，尽管这些会党首领接受过康有为的赠款，令毕永年一度失望而削发为僧，唐才常的政治宗旨与林圭等人又不一致，但兴中会对自立军系统的影响却一直赖以保持。

汉口义群公司成立后，林圭、容星桥、张尧卿等议定开办银矿轮栈，分派会党头目担任各路之探险联络。随后由容星桥、张尧卿到日本与孙中山商议行动计划，“中峰待之甚恳挚，然所商尚无一定之规”，只是委派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林圭从返回汉口的张尧卿处获悉有关情况，致函容星桥，请其“此次与中峰必须商定一是，否则本公司之名已流播四方，而实在尚未起蒂。今日之事，我辈如大舟已行至江中，舵不灵稳，则舟将覆；人工不力，则将退而不前。倘尚有翻覆而解散之，则不惟貽笑目前之大众，即后来传道亦属难堪”。^②由此可见，至少在义群公司时期，汉口的兴中会、兴汉会和湖南维新派联成一体，而视孙中山为舵手和引导。

①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22页。

②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22页。